

中德文化丛书
叶隽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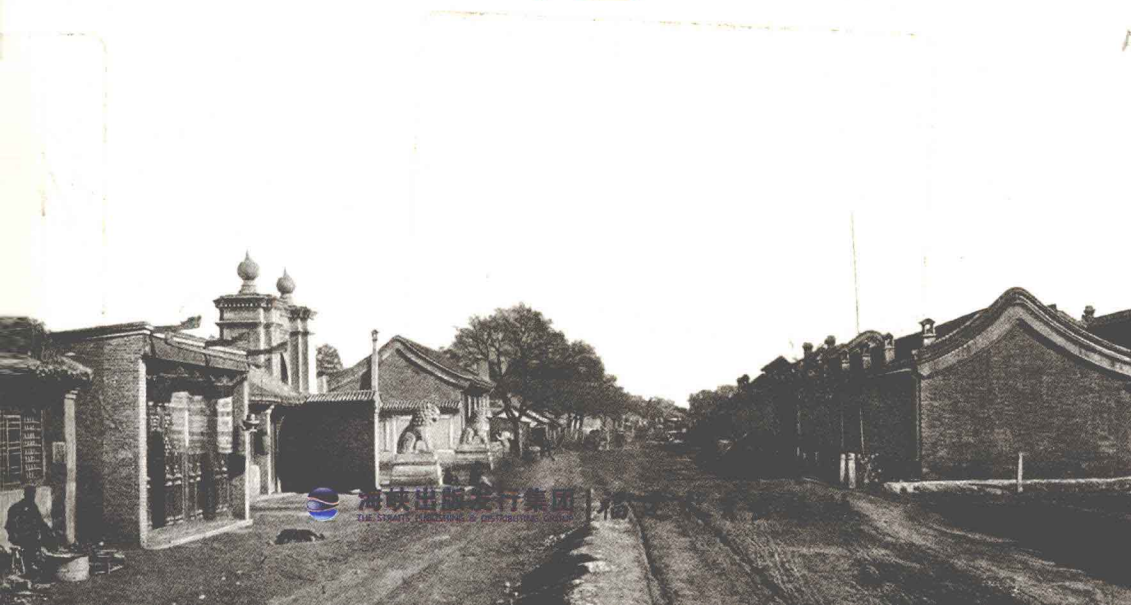
[1896—1899年]

我们在中国仿佛面对着一堵高墙，所有欧洲的想法和观点撞击在这堵墙上，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响；不仅如此，中国人和欧洲人在观念上有着天壤之别，在他们中间飞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德国公使夫人日记

◎（德）海靖夫人 著

◎秦俊峰 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德国公使夫人日记

◎ (德) 海靖夫人 著

◎ 秦俊峰 译



[1896-1899年]

我们在中国仿佛面对着一堵高墙，所有欧洲的想法和观点撞击在这堵墙上，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响；不仅如此，中国人和欧洲人在观念上有着天壤之别，在他们中间飞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公使夫人日记/(德)海靖夫人著;秦俊峰译.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334-5679-5

I. ①德… II. ①海… ②秦… III. ①日记—作品集
—德国—近代 ②中国历史—史料—近代 IV. ①I516.64
②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3744号

德国公使夫人日记
(德)海靖夫人 著
秦俊峰 译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27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出版人 黄旭
发行热线 010-62027445
印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大兴黄村镇三间房村委会北500米 邮编:102600)
开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6.5
插页 2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5679-5
定价 3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部(电话:010-62027445)联系调换。

“中德文化丛书”总序

叶 隽

一、中、德两国在东、西方（亚欧）文化格局中的地位

华夏传统，源远流长，浩荡奔涌于历史海洋；德国文化，异军突起，慨然跃升于思想殿堂。作为西方文化、亦是欧陆南北对峙格局之重要代表的德国，其日耳曼统绪与位于亚洲南部的印度文化颇多血脉关联，而与华夏文明恰成一种“异体”态势，这可谓“相反相成”之趣味。

作为欧陆南方拉丁文化代表之法国，恰与中国同类，故陈寅恪先生谓：“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诚哉斯言，在西方各民族文化中，法国人的传统、风俗与习惯确实与中国人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当然也不排除文化间交流的相互契合：诸如科举制的吸纳、启蒙时代诸子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接受等皆是。如此立论，并非敢淡漠东西文化的基本差别，这毕竟仍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分野；可无论是“异于中国”，还是“趋于中国”，均见钱钟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言不虚。

在亚洲文化（东方文化）的整体格局中，中国文化属于北方文化，印度文化才是南方文化。中印文化的交流史，实际上有些类似于德法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属于地缘关系的亚洲陆地上的密切交流，并由此构成了东方文化的核心内容；遗憾的是，由于地域太过辽阔，亚洲意义的南北文化交流有时并不能相对频繁地形成两种文化之间的积极互动态势。因为，两种

具有互补性的主导性文化，往往能够推动人类文明的较快推进，这可能是一个基本规律。

西方文化发展到现代，欧洲三强英、法、德各有所长，可若论地缘意义上对异文化的汲取，德国可拔得头筹。有统计资料表明，在将外语文献译成本民族语言方面，德国居首。其中对法国文化的吸收更成思想史上一大公案，乃至一口流利法文的歌德那一代人，因“过犹不及”而不得不激烈反抗法国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无论正反事例，都足证德意志民族“海纳百川”的学习情怀。就东方而言，中国文化因其所处地理中心位置，故能得地利之便，尤其是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汲取，不仅是一种开阔大度的放眼拿来，更兼备一种善择化用的创造气魄，一方面是佛教在印度终告没落，一方面却是禅宗文化在中国勃然而起。就东方文化之代表而言，或许没有比中国更加合适的。

中德文化关系史的意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全局眼光中才能特别凸显出来。即这是一种具有两种基点文明代表性意义的文化交流，而非仅一般意义上的“双边文化关系”。也就是说，这是东西文化内部的两种核心子文化的交流，即作为欧洲北方文化的条顿文明与亚洲北方文化的华夏文明之间的交流。这样一种主导性的文化间的交流，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二、作为文明进程推动器的中德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的“超人三变”

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是文明进程的推动器。诚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这一论断，也早已为第一流的知识精英所认知，譬如歌德、席勒那代人，非常深刻地意识到走向世界、汲取不同资源的重要性，而中国文化正是在那种背景下进入了他们的宏阔视阈。当然，我们要意识到的是，对作为现代世界文明史巅峰的德国古典时代而言，文化交流的意义极为重要，但作为主流的外来资源汲取，是应在一种宏阔的侨易学视域（此概念作者将专文论述，此处不赘）中去考察的，这一点歌德总结得很清楚：“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

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此处涉及到文化交流的规律性问题，即如何突出作为接受主体的主动选择性，若按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不仅是中國精英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资源的态度，推而广之，对各国择取外来资源与创造本民族之精神文化，皆有普遍参照意义。总体而言，德国古典时代对外来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汲取与转化创造，是一次文化交流的质的提升。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其意义在此。

至于其他方面的双边交流史，也同样重要。德印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德国学者涉猎较多且深，尤其是其梵学研究，独步学林，赫然成为世界显学，正与其世界学术中心的地位相吻合。而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的第一流学者，如陈寅恪、季羨林等就先后负笈留德，所治正是梵学，亦可略相印证。中法文化交流史内容同样极为精彩，由启蒙时代法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汲取与借鉴到现代中国发起浩浩荡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其转易学师的过程同样值得深入探究。总之，德、法、中、印这四个国家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应当归入“文化史研究”的中心问题之列。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或多或少会将关注的目光更投入到中国问题本身。必须加以区分的是所谓“古代中国”、“中世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概念分野。前者相当于传统中国的概念，即文化交流与渗透尚未到极端的地步，尤以“先秦诸子”思想为核心；“中世中国”则因与印度佛教文化接触，而使传统文化受到一种大刺激而有“易”，禅宗文化与宋儒理学值得特别关注；“现代中国”以基督教之涌入为代表，西学东渐为标志，仍在进程之中，乃是以汲取西学为主的广求知识于世界，可以“新儒家”之生成为关注点。经历三变的中国，“内在于中国”为第一变，“内在于东方”为第二变，“内在于世界”为第三变，三变后的中国，才是具有悠久传统而兼容世界文化之长的代表性文化体系。

先秦儒家、宋儒理学、新儒家思想（广义概念）的三段式过渡，乃是中国思想渐成系统与创新的标志，虽然后者尚未定论，但应是相当长时期

内中国思想的努力方向。而正是这样一种具有代表性且兼具异质性的交流，在数量众多的双边文化交流中，具有极为不俗的意义。张君勱在谈到现代中国的那代知识精英面对西方学说时的盲目时有这样的描述：“好像站在大海中，没有法子看看这个海的四周……同时，哲学与科学有它们的历史，其中分若干种派别，在我们当时加紧读人家教科书如不暇及，又何敢站在这门学问以内来判断甲派长短得失，乙派长短得失如何呢？”这其中固然有个体面对知识海洋的困惑，同时也意味着现代中国输入与择取外来思想的困境与机遇。王韬曾感慨说：“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不仅表现在政治军事领域如此，在文化思想方面亦然。而当西方各强国纷纷涌入中国，使得“西学东渐”与“西力东渐”合并东向之际，作为自 19 世纪以来世界教育与学术中心场域的德国学术，则自有其非同一般的思想史意义。实际上，这从国际范围的文化交流史历程也可看出，19 世纪后期逐渐兴起的三大国——俄、日、美，都是以德为师的。

故此，第一流的中国精英多半都已意识到学习德国的重要性。无论是蔡元培强调：“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而先赴青岛习德文”，还是马君武认为“德国文化为世界冠”，都直接表明了此点。至于鲁迅、郭沫若乃至蒋介石等都有未曾实现的“留德梦”，也均可为证。中德文化研究的意义，端在于此，而并非仅仅是众多“中外文化交流史”里的一个而已。如果再考虑到这两种文化是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方文化之个体（民族－国家文化），那么其意义就更显突出了。

三、在“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关联背景下理解中德文化关系的意义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划地自牢”，因为只有将视域拓展到全球化的整体联动视域中，才能真正揭示规律性的所在。所以，我们不仅要谈中国文化的西传，更要考察波斯－阿拉伯、印度、日本文化如何进入欧洲（西方）。这样的东学，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东学。当东学西渐的轨迹，经由这样的文化交流史梳理而逐渐显出清晰的脉络时，中国文化也正是在

这样一种比较格局中，才会更清晰地彰显其思想史的意义。这样的工作，需要学界各领域研究者的通力合作。

而当西学东渐在中国语境里具体落实到 20 世纪前期这辈人时，他们的学术意识和文化敏感让人感动。其中尤其可圈可点的，则为 1930 年代中德学会的沉潜工作，其标志是“中德文化丛书”的推出，这其中不仅有《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这样的系统翻译工程，也包括《中德学志》等刊物的学术功用……至今检点前贤的来时路，翻阅他们留下的薄薄册页，似乎就能感受到他们逝去而永不寂寞的心灵。昔贤筚路蓝缕的努力，必将为后人开启接续盛业的来路。光阴荏苒，竟然轮到了我们这代人。虽然学养有限、社会功利，但对前贤的效慕景仰之心，却无有或减。如何以一种更加平稳踏实的心态，继承前人未竟之业，开辟后世纯正学统，或许就是历史交给这代人的使命。

不过我仍要说我们很幸运，当冯至、陈铨那代人不得不因了民族战争的背景而辗转颠沛于流离战火中时，一代人的事业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宣告中断”时，我们却可能静坐于书斋之中。虽然市场经济的大潮喧嚣得似要推翻学院里“平静的书桌”，但毕竟书生还有可以选择的权利。在清苦中快乐、在寂寞中读书、在孤独中思考，这或许，已是时代赠与我们的最大财富。

所幸，在这样的市场大潮下，能有出版人的鼎力支持，使这套“中德文化丛书”得以推出。我们不追求一时轰轰烈烈吸引眼球的效应，而希望能持之以恒、默默行路，对中国学术与文化的长期积淀略有贡献。在体例上，丛书将不拘一格，既要推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著述，亦要译介国外优秀的学术著作；就范围而言，文学、历史、哲学固是题中应有之义，学术、教育、思想亦是重要背景因素，至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鲜活的社会科学内容，也都在“兼容并包”之列；就文体而言，论著固所必备，随笔亦所欢迎；至于编辑旧文献、译介外文书、搜集新资料，更是我们当学习德国学者、努力推进的方向。总之，希望能“水滴石穿”、“积跬步以致千里”，经由长期不懈地努力，将此丛书建成一个略具规模、裨益各界的双边文化之库藏。

序言

一个公使夫人眼里的中国

在晚清和民国，德国人在中国的声誉不错。从传教士到商人，从士兵到亲王，凡是来华的德国人，跟中国人相处得大体和谐。严谨的日耳曼人和大大咧咧的中国人，居然彼此都有好感。以至于一战期间日本人占了青岛和胶济线，中国人反弹强烈，一些美国人很是不解，说德国人占了那么长时间，好像没听说你们这样反感，怎么日本人刚来，你们就这样愤怒？中国外交官的回答是，德国人守规矩，而日本人不规矩。

在一战期间，中国政府为了是否跟在协约国屁股后面参战，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还起了矛盾。因为这样参战，就意味着要跟德国宣战。而中国人不乐意跟德国人闹翻的，大有人在。包括力主参战的总理段祺瑞，他最亲的智囊徐树铮，就是一个亲德派。当年日本进攻青岛，青岛德军严重缺乏陆战武器，时任陆军次长的徐树铮，还瞒着他的主公，偷偷给德国人运去了一万支步枪。

当1917年中国参战成为定局，德奥变成中国的交战国时，在中国的一些德国军人，被关进了战俘营。但在北京郊区的战俘营，里面的德国人得到了最大的优待，每人每天的伙食，达到几十个大洋。要知道，那年月，一个中国家庭，一个月能有5到7元，就过得挺好的了。战俘营里，里面游泳池、网球场一应俱全。想要出去溜达溜达，也悉听尊便。有人说，这

些德奥的俘虏，不是在蹲战俘营，而是在度假，有人伺候的度假。这样良好的中德关系，一直延续到中国抗战爆发之后若干年。虽然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是盟友，但凡是来过中国的德国人，对中国人其实更有好感。如果让他们选择的话，盟友应该是中国而非日本。

不过，中德关系也有严冬，严冬就在中国甲午战后到庚子义和团运动这一段。而这段时间的德国公使，有两位，一位是海靖，埃德蒙多·冯·海靖男爵（Edmund Friedrich Gustav von Heyking, 1850—1915），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克林德。在前者手里，德国人强占了胶州湾，把山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后者继续着海靖的事业，但不幸地赶上了拳乱，死在了将要进攻使馆区的清军手里。

海靖夫人，就是德国公使海靖的夫人，一个在非常时期来到中国的外国公使夫人。出身普鲁士贵族的小姐，一个来自欧洲中心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对19世纪末的中国，能有什么印象，不问也能猜到一二。那时的中国，虽然有了少数的工厂，部分军队装备了洋枪洋炮，但整体的面貌却还是中世纪的。即使北京城，也到处都是垃圾，行人随地大小便，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太后的骄奢淫逸，跟平民的困苦贫穷，皇城和少数皇家园林整洁优雅，跟平民区的恶臭熏天，形成鲜明的对照。踏上中国土地的海靖夫人显然是被这肮脏和恶臭给吓到了，在她的日记里，随处可见这样的抱怨，在她的眼里，除了个别拉纤的纤夫一身的紫铜色的肌肉，没有什么中国人和中国东西能给她留下好印象。连一向有外国人缘的李鸿章，在她的眼里，也举止粗鄙，当众挖鼻屎，还有一个专门盛鼻屎的银杯子。

中德礼仪之别，不止事关文明，而且有关政治。我们知道，自打中国设立总理衙门，同意外国公使驻京，可以觐见中国皇帝，递交国书以来，所有的外国公使，进紫禁城见皇帝，不仅要旁门进来，而且进来之后只能走两旁的小道。虽然从理论上万国共主、万国来朝的天下格局被粉碎了，但暗地里中国人依然用进门走路这种小把戏，占老外的便宜，实践着精神上的胜利。尽管老外也未必不知道中国人这种小把戏里面的名堂，但只要能在交涉中占到便宜，一直都没有人在意中国人这点小小的“外交胜利”。

但是，德国公使海靖不肯。他来中国，身负着德皇威廉二世占领更多天空下土地的使命，揭开了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第一幕。这个后起列强的代表，自身的使命，就带有挑战性。他不仅处处锋芒毕露，充满挑衅，连外出旅行，碰上小孩子在后面扔石子（并没有伤到谁），都要求中国地方官道歉。一次觐见光绪皇帝之后，出来的德国公使，居然昂然走在了中间的通道上。同去的总理衙门官员马上把他拉了回来。回到使馆，他就借口这一拉，正式提出抗议，否则不再出席任何总理衙门的宴会。无论总理衙门怎样解释，当事人也道了歉，但只要没有经过正式的手续，海靖就是不肯妥协。弱国无外交，无尊严。最终，还是由李鸿章领着当事人，亲自来到德国使馆道歉，才让事态平息。

海靖的蛮横和跋扈，在德国占领胶州湾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总理衙门王大臣恭亲王奕訢和实际上的主事人李鸿章都表现出空前的愤怒，双方关系一度剑拔弩张，也有朝臣宣称不惜一战。但刚刚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的中国人，面对德国人的寸步不让，得寸进尺，还是只能妥协。中国北方的第一良港，胶州湾就这样被强租了去，99年，到期中国政府收不回，就只能归日耳曼人了。横贯中国腹地，圣人之乡的胶济铁路，路权也丢在德国人手里，顺便，山东成为德国人夹带里的物件。什么时候，只要人家想要，就是人家的。德国人开了头，列强的强租强占成风，中国的边疆危机凸显，良港被人占遍，自己的海军，居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停泊港口。中国人最屈辱的岁月，是海靖夫人亲见，也跟她的夫君有点关系。充满了白人优越感的海靖，虽然身份是外交使节，但其凶悍一点都不亚于进入中国领土的普鲁士大兵。

爱记日记的海靖夫人，留下了一份在华经历的日记。〔这日记尽管充斥了偏见，甚至不乏敌意，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史料，一个第三只眼看中国的现场记录。〕剔除那些偏见和敌意，我们可以从中找出好些好玩的东西，有了这份记录，现在的中国人就能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和中国人曾经的政治、文化和生活状态。显然，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看了这份日记，不能只是愤怒，而更多的应该自省和反思。面对曾经的屈辱，仅仅抱怨、

痛苦甚至哭闹是无益的。中国人自立于民族之林，靠的是多少年来在屈辱中的奋进和建设。今天的世界，过去的殖民暴政已经一去不复返，人类已经告别了丛林，步入文明。已经不大可能会有哪一个国家，强租人家的港口，侵占人家的土地了。即便是落后国家，也不大可能有亡国的危险，但这样的国家，要想让人真正看得起，不仅要有经济总量的增加，还需要国民迈向文明的努力，一点一滴的文明建设。

张 鸣

2011 年 9 月中旬旅次

前 言

近年来，中外学者对于 19 世纪晚期、特别是胶澳被占前后中德两国关系的研究颇有成果，发表了不少专著或论文，两国史学家们对这段历史的挖掘和还原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深度和广度。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该段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的研究略显不足。因此，海靖公使夫人伊丽莎白的日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缺憾。

该本日记涵盖了海靖夫妇的在华岁月，即从 1896 年 7 月 16 日抵达吴淞口，至 1899 年 6 月 4 日离开青岛。在日记里，不仅可以读到海靖夫妇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从中深切体会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表们在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打量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极度的傲慢、鄙夷和偏见；还可以回顾晚清末年中国与西方列强屈辱卑微的弱国外交，身临其境地感受正在崛起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与日渐衰微的大清帝国的每一次外交交锋中展现出来的刀光剑影和贪得无厌。

笔者拟在前言部分从生平简介、使华背景、《来自世界四方的日记》及其他文学创作等四个方面着手，全面介绍伊丽莎白的人生历程，以便读者更好地品读《来自世界四方的日记·中国篇》，更准确地把握作者的写作心理和动机。

一、生平简介

伊丽莎白·冯·海靖 (Elisabeth von Heyking, 1861—1925), 原名伊丽莎白·露易丝·奥古斯特·海伦娜·冯·弗莱明 (Elisabeth Luise Auguste Helene von Flemming), 1861 年 12 月 10 日出生于普鲁士王国的一个贵族家庭, 父亲阿尔伯特·冯·弗莱明伯爵 (Albert Graf von Flemming, 1813—1884) 曾担任过普鲁士驻巴登王国的公使, 母亲阿姆伽特 (Armgarth von Flemming, 1821—1880) 来自卡尔斯鲁厄市的上流阶层。外祖父母阿基姆·冯·阿尔尼姆 (Achim von Arnim, 1781—1831) 和贝蒂纳·冯·阿尔尼姆 (Bettina von Arnim, 1785—1859) 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思潮——海德堡浪漫学派的杰出代表和作家, 妹妹伊莲娜·福伯斯—莫泽 (Irene Forbes - Mosse, 1864—1946) 在文学领域也颇有建树。

正是来自家庭的熏陶, 使得伊丽莎白从小便有机会接触到文艺界的名流。诸如著名作曲家安顿·鲁宾斯坦 (Anton Rubinstein)、女钢琴家克拉拉·舒曼 (Clara Schumann)、歌唱家包丽娜·维阿多特 (Pauline Viardot)、作家伊万·图根耶夫 (Iwan Turgenjew)、路德维希·奥尔巴赫 (Ludwig Auerbach) 和维克多·冯·舍费尔 (Victor von Scheffel) 等人均为伊丽莎白父母的座上常客, 但最令伊丽莎白产生兴趣的是“写书的人”。于是, 伊丽莎白从童年即开始尝试写作, 并与妹妹伊莲娜互相讲述写作的内容。

1880 年, 伊丽莎白的母亲去世。为排解痛苦, 父亲带上两个女儿去意大利旅游, 伊丽莎白的女友丽塔 (Lita zu Putlitz) 也随同旅行。在维罗纳期间, 伊丽莎白与丽塔的哥哥、经济学家施特凡·冈斯·埃德勒 (Stefan Gans Edler zu Putlitz, 1854—1883) 相识、相爱, 并于次年成婚, 育有一女施特凡尼 (Stefanie)。婚后不久, 埃德勒在柏林大学经济学系谋得教授职位, 举家迁往柏林。在柏林期间, 因为生活的孤单和性格的差异 (据说埃德勒言行举止十分粗俗), 伊丽莎白逐渐与丈夫产生了隔阂, 甚至想到了回娘家。恰在此时, 她遇见了埃德勒的学友埃德蒙多·冯·海靖男爵 (Edmund Friedrich Gustav von Heyking, 1850—1915) 并彼此一见钟情。

埃德蒙多·冯·海靖男爵，1850年3月16日出生于俄国一个贵族家庭，年轻时曾在海德堡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学，学生期间即对政治十分热衷。1874年起效力于沙俄政府，1876年被派往美国费城。1878年辞职，转任《里加评论》、《巴尔干月刊》等报刊主编。出于对“铁血宰相”俾斯麦侯爵的崇拜，于1879年来到柏林，两年后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因此与埃德勒相识。1881年初，海靖放弃俄国国籍，加入德国国籍。在俾斯麦侯爵长子赫伯特·冯·俾斯麦（Herbert von Bismarck，1849—1904）的引荐下，为德国内政部录用，数月后调至外交部，并凭借与俾斯麦家族的关系平步青云。

自从与海靖结识后，伊丽莎白仿佛焕发了青春，更加渴望从婚姻的束缚中得到解脱，于是便向埃德勒提出了离婚请求。为顾及颜面，埃德勒未同意离婚，甚至以割脉自杀的方式试图挽回婚姻，但伊丽莎白仍不为所动。在对婚姻的绝望之下，埃德勒于1883年7月在柏林的家中饮弹自尽，成为当时颇具爆炸性的新闻。

丈夫死后不久，伊丽莎白不顾世俗偏见，带着女儿与海靖先后来到威尼斯度假，从而印证了外界对他们的私情的猜测，并引发了埃德勒家族和上层社会对伊丽莎白的口诛笔伐，谴责她“不为丈夫守孝”、“不守妇道”和“谋杀亲夫”；埃德勒的父亲还巧言骗取了施特凡尼的抚养权，直至两年后方由法庭判决将抚养权归还伊丽莎白。

面对外界种种压力，海靖主动向俾斯麦侯爵申请了一年休假，与伊丽莎白客居意大利。出于对女儿的担忧，阿尔伯特·冯·弗莱明伯爵也来到意大利，但不久即死于伤寒。为了安慰遭受沉重打击的伊丽莎白，海靖于1884年6月与其在佛罗伦萨举行了婚礼。期间，两人甚至想到了放弃外交部的工作，长居意大利。但出于生计的考虑，特别是1885年大儿子阿尔弗雷德的出生，促使海靖主动向外交部提出了派驻北美的请求。

1885年5月，海靖夫妇被派往德国驻纽约领事馆常驻，自此开始了近20年的驻外生活。1886年7月，海靖调任德国驻智利瓦尔帕雷索领事，1889年任驻加尔各答总领事（海靖夫妇的第二个儿子贡特即出生于当地），1894年任驻开罗总领事，1896年任驻华公使，1899年任驻墨西哥公使，1904年任驻贝

尔格莱德公使，后因病不得不中止外交生涯。

回到德国后，海靖夫妇先在汉堡定居，后举家迁往巴登—巴登。1914年，伊丽莎白继承了梦寐已求的克洛森宫殿，全家再次搬迁并在那里度过了她和丈夫一生中的最后岁月。1915年，海靖去世，此后伊丽莎白鲜与外界来往，只同闺中密友格莱特·里茨曼（Grete Litzmann）保持联系。1925年1月4日，伊丽莎白于柏林病逝，终年63岁。

纵观伊丽莎白的一生，有两个人对她的影响至关重要。一个是引领她走向文学之路的小姨夫海尔曼·格里姆（Herman Grimm, 1828—1901），另一人是象征精神寄托的埃德蒙多·冯·弗莱明伯爵（Edmund Graf von Flemming, 1827—1897）。因此，伊丽莎白的日记里常常出现这两个名字。

格里姆在柏林大学担任艺术史教授，娶伊丽莎白的小姨吉泽拉（Gisela von Arnim, 1827—1889）为妻。在伊丽莎白的眼中，格里姆过着无拘无束的学者生活，让她十分向往。格里姆也很疼爱自己的侄女，从小向她讲述德国文坛的许多趣事，并启发了她对歌德作品的浓厚兴趣。成年后，伊丽莎白经常与格里姆探讨文学与人生，甚为投机。因此，伊丽莎白称他为“在自己最困难的人生阶段总能够读懂自己并出谋划策的导师”。当海靖被任命为德国驻华公使后，伊丽莎白立即征询格里姆的意见（见本书附录1896年4月15日）。

临行前，格里姆又为海靖出谋划策（见本书附录1896年5月30日）。

弗莱明伯爵较伊丽莎白的父亲年幼14岁，因为膝下无儿无女，所以十分宠爱伊丽莎白，对她视若己出。在她的童年时代，曾经多次随同父母在弗莱明伯爵的住所格洛森宫殿（Schloss Crossen）和布科夫度假，并留下了美好、快乐的记忆。特别是美丽的巴洛克式建筑——克洛森宫殿拓展了年幼的伊丽莎白的无限幻想空间。即便在成年以后，长年漂泊在外的伊丽莎白始终将弗莱明伯爵视为“第二父亲”，将克洛森宫殿视为“心灵的家园”，并强烈渴望继承弗莱明伯爵的遗产。因此，在弗莱明伯爵病重至去世的那段时间，伊丽莎白通过日记宣泄自己的极度忧郁和悲痛之情（见本书附录1897年7月1日和9月18日）。

二、使华背景

海靖在任开罗总领事期间，出于其鲜明的“反英”政治立场，与英国驻埃及高级殖民官员克蓝玛勋爵相处甚不愉快，甚至想方设法为克蓝玛勋爵设置种种难题。为避免影响到德英关系，德国外交部于1885年12月2日提前将海靖召回，同时奏请德皇任命其为驻摩洛哥公使，以示安抚。

恰在此时，德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发生了显著变化。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皇威廉二世对英、法、俄等老牌殖民帝国在东亚、特别是在华享有的特权利益和势力范围既羡慕又妒，而1895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给德国提供攫取在华利益前所未有的良机。在德国积极斡旋和协调下，俄、法、德三国成功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德国此举可谓一举两得，既阻止了日本在华势力进一步扩张可能危及德国在华长远利益，又可以“三国还辽”居功，借机索要租界、军港等，从而建立自己的在华势力范围。1895年10月，中德两国先后订立《汉口租界合同》和《天津租界合同》，德国得以在上述二地设立租界，开辟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清政府在租界问题上的退让和妥协非但没有满足德皇威廉二世的扩张野心，反倒使其看穿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谋取在华军事基地的欲望更加迫切。就在中德订立租界合同的同时，驻华公使绅珂受德皇指示，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德国海军需在中国沿海获一港口以作“储煤”之用。因总理衙门久未答复，绅珂乃于12月再次提出同样要求，后为清政府以“德国之请无先例，恐他国争先效仿”为由加以拒绝。此后，德国又多次向中国施压未果。面对清政府的一再拒绝，德皇威廉二世极为恼火，下定决心以武力实现其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的目的。为此，德皇任命心腹大将提尔皮茨元帅出任德国东亚巡洋舰队司令官，同时指示外交部积极物色尚武好战的强硬人物以替代绅珂出任德国驻华公使，而性情暴躁、推崇殖民主义、崇尚武力征服的海靖自然成为不二人选。但是，因为海靖的特立独行，使其成为外交部里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经过反复酝酿，外交部最终提名海靖接替绅珂担任德国驻华公使。关于此项任命的经过，伊丽莎白在日记中有详细的叙述（见本书附录1896年4月13日）。

如日记中所述，海靖夫妇对于驻华公使一职甚为满意。甚至在该项任命尚